



青年巴金

巴金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,他的《激流三部曲》和《爱情三部曲》是几代中国文青的必读书目。改革开放后,历经磨难的巴金踏进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,其反思“文革”的随笔集《随想录》以“敢说话、说真话”而著称,被誉为“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”。今年11月25日是巴金110周年诞辰,在这个特殊的日子,我们再次走进这位文学巨匠的世界,去梳理、体会他的爱,他的恨,他的情,他的人生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创作

谈起巴金,很多人都会关注这个名字的由来。

巴金原名李尧棠,号芾甘,除此之外,笔名“巴金”。关于这个笔名的由来,最流行的说法是来自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,其实真实情况并非如此,巴金在1957年9月27日致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对自己的名字作了注解:“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《灭亡》要在原稿上署名,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。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《伦理学》,我看到了‘金’字,就在稿本上写下来。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,这个朋友姓巴,我和他在法国 Cha teau Thierry(法国城市名)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。他就是我在《死去的太阳》序文中所说的‘我的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’的那个中国留学生。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,但是在外国,人多么重视友情。我当时想到他,我就在‘金’字上面加了一个‘巴’字。从此‘巴金’就成了我的名字。”

众所周知,《激流三部曲》是巴金公认的代表作,而《家》又是其中思想和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。小说以蜀中的一个大家族为背景,描绘了觉新、觉民、觉慧、瑞珏、梅表姐、鸣凤、高老太爷、冯乐山等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,为中国现代文学画廊增添了一大批鲜活的文学形象。

《家》是巴金以自己的家族为原型创作的,大哥李尧枚给了巴金不少鼓舞和激励。李尧枚就是小说中大哥“觉新”的原型,是一位善良却又有些懦弱的知识分子,1929年7月,李尧枚来上海探望巴金,兄弟俩谈及自己的家庭时,巴金说要写一部反映大家庭生活的长篇小说,大哥听了很赞成,后来他在给巴金的信中说:“《春梦》(《家》的原名)我很赞成;并且以我们家的人为主人公,尤其赞成。实在的,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。我自得到《新青年》书报,读过以后,我就想写一部书来,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。现在你想写,我简直喜欢得不得了。”

大哥的鼓励让巴金大受鼓舞,大哥一生受家族礼教的束缚,“读到我的小说,也许会觉悟,也许会毅然地去走新的路”,巴金这样希望。但就在巴金刚刚开始创作时,大哥却服毒自杀了,据说是“不堪生活的重压”。巴金闻讯悲痛欲绝:“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。……没有挽救他,我感到终生的遗憾。我只有责备自己。”1933年5月,《家》由上海开明书店正式出版,巴金挥笔写下了名为《呈献给一个人》的序言,这“一个人”,就是大哥李尧枚。

1930年代初期开明书店还出版了巴金的另一部小说《死去的太阳》,这部小说以五卅惨案为背景,属于当时流行的“革命加恋爱”模式。对于这部小说,社会评价整体不高,抗战时期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先生曾经读过这本书,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:“读完了巴金的《死去的太阳》,这些所谓普罗文学,其实并无可采之处。”陈克文的意见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,这也是巴金一生创作的一个败笔。

爱情

长篇小说《家》出版后,深深唤醒了青年一代,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,当时有不少青年人给巴金写信,探讨理想、人生等问题,其中一个署名“一个十几岁的女孩”的女学生引起了巴金的注意。两人通信大半年了,但还没有见过一次面,后来女孩在信中说:“笔谈如此和谐,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?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。”信中夹着一张她的照片,戴着一顶圆边遮阳帽,明眸皓齿,清丽可人,照片背后写着这样一行小字:“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,阿雯。”

这个活泼可爱的“阿雯”就是后来成为巴金夫人的萧珊,当时叫陈蕴珍,两人的这次会面也成了他们恋爱的起点,当时巴金32岁,萧珊19岁。多年以后,巴金在文章中回忆说:“她是我一个读者。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。……我认识她的时候,她还不到二十,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。她读了我的小说,给我写信,后来见到了我,对我发生了感情。”

经过八年的恋爱长跑,巴金和萧珊在贵阳一个叫花溪的小镇结合了,他们的新房就在一家名为“小憩”旅馆里,巴金在文章中回忆了二人的洞房花烛夜:

我们结婚那天晚上,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,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、碰杯,吃完晚饭,散着步回到宾馆。宾馆里,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。我们当时的打算是这样:萧珊去四川旅行,我回到桂林继续写作,并安排我们婚后的生活。我们谈着,谈着,感到宁静的幸福。四周没有一声人语,但是溪水流得很急,整夜都是水声,声音大而单调。那个时候我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要求。我只是感觉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,需要把它们消耗。我准备写几部长篇或中篇小说。

两人在贵阳一带旅行了近一周的时间,后来萧珊去了重庆,巴金留在贵阳,此间他开始中篇小说《憩园》的写作——这篇小说的名字是不是与他们结婚的“小憩”旅馆有关?

巴金与萧珊的爱情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美丽童话,近三十年的岁月两人相濡以沫,心里装的都是对方。1972年萧珊孤独离世,而巴金正在接受“改造”,当她的“李先生”(萧珊对巴金的称呼)穿着不整洁的白衬衫匆忙赶到时,萧珊已闭上了眼睛。“我记起了《家》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:‘好像珏死了,也是一个不祥的鬼。’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,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!”巴金在《怀念萧珊》中的这段话让人欲哭无泪。

巴金把一生的爱都留给了萧珊,《怀念萧珊》、《再忆萧珊》和《一双美丽的眼睛》是他对她最好的纪念。



萧珊送给巴金的第一张照片,照片背后写着“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,阿雯”。

反思

改革开放后,巴金开始反思“文革”,他准备用真实的写作和思索,来填补自己的精神空白。1978年12月,巴金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开辟“随想录”专栏,12月1日,巴金写下开栏第一篇文章《谈〈望乡〉》。

巴金的这篇随笔与当时的一场争论有关,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,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项主要内容,当时在中国公映了三部日本电影:《追捕》、《望乡》和《狐狸的故事》。其中《望乡》描写了妓女阿崎婆一生的悲惨故事,但在中国公映后却引起了争议,有人说这是黄色电影,应该禁演。在这种背景下,巴金接连写了《谈〈望乡〉》和《再谈〈望乡〉》两篇文章,公开表示反对删剪电影,反对禁演电影,他在文中这样评价:“据说老年人对《望乡》持反对态度的多,我已经踏进了七十五岁的门槛,可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,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。”以此为肇始,巴金开始了用写作干预现实,反思历史的双重使命。

进入1980年代后,巴金又遭遇了“《苦恋》风波”。《苦恋》是以画家黄永玉为原型拍摄的一部电影,通过一个人的故事,演绎了归国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“文革”中的悲剧。1981年春夏之交,《苦恋》遭到严厉批判,一时间人心惶惶,甚至连“文革”也成了报刊上的敏感词。1981年9月,巴金去法国访问,有国外媒体提及《苦恋》,巴金回答说:“我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,但是我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引起不同的评论是正常的。虽然有些批判,这无关紧要。你永远可以进行辩护。归根到底,只应有读者作出评判。”巴金的回答引起国内某些人物的不满,认为与上面的口径不一致,巴金满不在乎:“不管他,有意见就有意见好了。随它去!”

从《谈〈望乡〉》到《苦恋》,巴金以“说真话”的面目重新启程,他曾说过自己是“五四运动”的产儿,时隔多年后,老年巴金又开始了五四精神的回归。巴金后来在《随想录》合订本序言中说:“我最初替《望乡》讲话,只觉得理直气壮,一吐为快,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。从无标题到有标题,从无计划到有计划,从梦初醒到清醒,从随想到探索,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,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。”

巴金的反思精神和“说真话”的态度也影响了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,他的老友萧乾1980年代初在媒体撰文细述与叶君健几十年前的一段恩怨,巴金看到后先后几次写信批评萧乾,他在信中写道:“来日无多,要善于利用,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,我们已经浪费得太多,太多了。”在致戏剧家曹禺的信中,巴金更是坦率,他对曹禺说:“你有很高的才,但有一个毛病,怕这怕那,不敢放胆去写,顾虑太多。你应当记住,你心灵中有多少宝贝啊。”

《随想录》是巴金晚年思索的结晶,也是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刻反省和忏悔。“我的《随想录》好比一只飞鸟,鸟生双翼,就是为了展翅高飞。”巴金在书中这样写道。

他做到了。☐

巴金的人生三部曲

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

巴金的《爱情三部曲》